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皮明勇
侯昂好
编

杨 蒋
百
杰 里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4037393



B25
30
V13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皮明勇
侯昂好
编

杨蒋
百
杰里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725371

B25
30
V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蒋百里, 杨杰卷/皮明勇, 侯昂好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0-18718-1

I. ①中… II. ①皮… ②侯…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蒋百里 (1882~1938) -思想评论 ③杨杰 (1889~1949)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2708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蒋百里 杨杰卷

皮明勇 侯昂好 编

Jiang Baili Yang Jie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35 插页 2

字 数 553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以字行,晚年号澹宁,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硤石镇人。中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在近代有“天生兵学家”、“兵学泰斗”、“军事学之父”、“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之称,又与杨杰合享“北蒋南杨”之美誉。1901年留学日本,4年后以全校之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38年5月起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1月,病逝于任上。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蒋百里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成就闻名于世。他精通日、德、英、法四种外文,热切关注欧美和日本军事新技术、新理论、新制度,及时将相关书籍译出,在国内进行广泛传播和普及。他在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军事理论之间进行沟通、融合,最终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起中国近代军事理论。他既注重对现实的应对,又致力于理论上的超越;既饱含民族热情,又富于科学理性。其主要著述有《孙子浅说》、《军事常识》、《裁兵计画书》、《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蒋百里抗战论集》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代表作为《国防论》。其代表性学术观点是,在国防理论方面提出“总体战”,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对抗日“持久战”。

(一) 融合与超越:构建中国近代军事学

蒋百里的突出贡献在于大量介绍近代西方军事理论,传播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20世纪前30年,中国军事学正处于新旧转轨之际,国人所了解的西方军事学还只限于军事技术的某些方面,对

军事学术、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研究还极薄弱。蒋百里致力于改变这种情况，在《孙子新释》、《孙子浅说》等著作中，开始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解读方式，沟通中国与西方的军事学。其所著《军事常识》、《国防论》等军事论著，则更加注重对西方军事科学与军事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推动了西方军事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拓宽了中国近代军事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它从融合、传播走向构建和超越。

蒋百里的《孙子新释》改变了宋元明清以来以校释为主的孙子学研究传统，不再过多地对原文进行校订和释义，转而注重对孙子思想原则的现代阐述。他大量引证战史和中西军事学理论，一方面印证孙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发挥孙子的兵学原理，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在《孙子新释》中，他所引用的西方军事著作就有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毛奇的《普法战史》和《普奥战史》，以及布鲁梅的《战略论》，并将这些军事论著的观点与《孙子》细加比较，致力于融会中西军事学说。

为了把握东西方军事理论的精髓，蒋百里在对《孙子》的解读中，常常以西方多种军事理论观点进行比较研究，体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比如，他在“兵者，国之大事”后，附注毛奇和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见解，然后评论道：“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指毛奇认为现代战争已经超出个人欲望成为国家之事——编者注），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指《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编者注）批注矣，岂不异哉？”他还比较了多家关于战争的定义，择其精要而采之。毛奇的《普法战史》对战争的定义是：“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战争的定义是：“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布鲁梅的《战略论》对战争的解释是：“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他认为，三条注释中克劳塞维茨的解释最深刻明确，故采用这一条来注释战争。他说：“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是为近世战之特性。”并举例说明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日俄和德英等国之间政略冲突的结果。^①

^① 参见蒋百里：《孙子新释》，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从蒋百里的军事学术历程看，无论是清末倾慕鼓吹军国主义，还是北洋时期对国民自卫和义务兵役制度的提倡，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国防理论的创建，都非常注重对西方战史战例、军事学说的引介和研究。这贯穿于他的整个军事学术活动，也成为他军事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他对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的介绍，打破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军事学模仿日本和德国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的格局。自18、19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意大利都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特色，世界军事科学开始了飞速发展。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日本与德国，难免狭隘，也不利于了解整个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其他国家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蒋百里虽然在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但他的关注范围并不囿于日、德，而是综合分析和研究世界上各种先进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学说，博采所长，为我所用地介绍了法国军事家的理论与著述，介绍了瑞士和美国的义务兵役制，也介绍了意大利的空战理论。他根据普法战争的具体实际指出，普鲁士的佣兵制是最不经济的，而拿破仑的征兵制是最经济的，从而得出却隆霍斯脱确定的“义务兵役制”势在必行的结论。

蒋百里注重揭示中国传统兵学与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能够相融相通的基本精神和根本原理。约米尼说：“战争似乎与一千种因素有关。”军事学确实关系到大量复杂因素，但其中又蕴涵着最基本的可以把握住的要素。在蒋百里看来，《孙子》与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著作有最基本的相通之处，这就是它们都基于或符合科学精神。“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①“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②这就为中国传统兵学接受西方影响、实现自身近代化找到了内在的必然性。

这种“以《孙子》原著十三篇为经，以东西洋之现代军事学为纬，冶于一炉，但仍以关于《孙子》之原则为主”^③的新模式，正是近代中国军事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取向，使得中国传统兵学在“温故”中得到西方军事学之“新”。对此，民国时期兵学研究者陈启天曾给予中肯的评价。他说：“民国初元，蒋方震首以现代兵学为《孙子》作新释，虽惜

①② 蒋百里：《孙子新释》，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③ 吴鹤云：《孙子兵法新检讨》，凡例，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

其书仅成第一篇，然从此为研究《孙子》者开一新途径，功殊不鲜。近年注释《孙子》之作，渐能温故知新者，殆多由蒋方震启之耳。”^①另一研究者陈华元也提到，蒋百里是“伪《司马法》著者、李靖、唐太宗后第四个真正明了《孙子》的人。……他的零散的偶然提到的说法均显露出真谛的所在，曾予本书以极大的暗示与助力。”^②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蒋百里在融合古今中西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的近代军事学。中国近代构建“独自兵学”的努力实际上自徐建寅在清末撰著《兵学新书》就已开始。但那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军事学多限于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方面，因此《兵学新书》只吸收了西方军事学中偏重技术的内容，不能算是完整的近代兵学。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更多西方军事学理论的输入，经过与中国传统兵学的比较和融合之后，逐步具备了构建“独自兵学”的条件。蒋百里紧贴中国的国情，围绕中国国防的性质、目标、基础、道路等重大问题，把军事、政治、经济、人口、外交、历史、文化、哲学、道德、心理、教育等各种要素引入国防领域，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国防理论。^③

他所撰写的《军事常识》体系较为完备，从形式到内容较为新颖，与此前众多的注释、汇辑、翻译类兵书相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军事常识》全书共八章，分别从政略与战略、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编制、教育和军政管理等方面，介绍西方各国、日本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和最近的军力情况，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加以论述。该书以其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成果的全面介绍、对西方军事思想观念的甄别吸收和对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的基本原理以及相应的军事制度所作的大致符合实际国情的完整规划，改变了中国近代长期没有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的落后状况，成为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重要奠基著作。此后，他撰写出版《国防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学的构建，确立了自己“近代军事学的开山之祖”的学术地位。

（二）倡导以自卫为目的、积极防御的新国防观

蒋百里认为，国防因敌而设，练兵因敌而强，无论是国防还是军备都既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又要有鲜明的针对性。他在《政略与战略》说：“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① 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44。

② 陈华元：《孙子新论》，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③ 参见吴仰湘：《蒋百里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征之以中外古今之事，而可信者焉。”^①

蒋百里所处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是强敌入侵、风雨飘摇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军事和军事家站在了风口浪尖，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为有强烈民族热情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蒋百里一方面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历史中深刻认识到国防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以十分敏锐的眼光审视中国国家安全环境，观察可能出现的威胁与挑战。根据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军事形势，他判定中国的主要敌国是日本，明确指出：“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②他把日本作为中国的第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的高度警惕。早在1922年，他就预想敌从东北来，估计中国军队将与之“作战于直隶平原”^③。次年，他进一步预想，“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衡阳”，估计日本侵略军将蹂躏江淮平原乃至江南广大地区。这一预言被后来事实证明非常准确。

在应对外敌侵略方面，蒋百里在早年鼓吹过军国主义，但稍后即转而主张自卫国防。他认识到，战争是交战双方政略冲突的结果，政略是由国家根本利益、基本国策决定的，“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④。他提出，中国国防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实行“最适于自卫，最不适于侵略”的民兵制，“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⑤，建设积极防御型的国防。他宣布，中国绝不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但会誓死自卫，抵抗侵略。强调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⑥

（三）以总体性战争为核心的全体国防论

在蒋百里看来，国防的手段和工具历来就多种多样，国防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国家图存之道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所不用

① 蒋百里：《国防论》，第四篇第一章，政略与战略（敌与兵）论战志之确定。

②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③ 蒋百里：《裁兵计画书》，第二编第七章。

④ 蒋百里：《军事常识》，第一章。

⑤ 蒋百里：《国防论》，第五篇第一章，裁兵与国防。

⑥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的状况。战争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总体性特征不断强化,其作战领域远远超出武装斗争,经济、外交、文化、思想、心理等领域的作战,都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①准备和实施总体性战争(即全民族战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基本任务和要求。一切现代国家的国防虽然都以军备为中心,但没有一个国家只重军事力量而不顾其他。因此,中国也必须建全体性国防,以全体性国防打赢总体性战争。

实行全民皆兵,进行全国动员。蒋百里认为,全体性国防首先就需要有强大的整体性国力。国力有三个元素,一为“人”,一为“物”,一为“组织”。他十分赞赏西方各国的全国皆战、全民皆兵。“有事之日,皆能倾其全国之力以从事于战争,可谓极人间之能事矣。”^②他大力倡导“军事生活与民事生活融成一片”的民兵制,要求在中国建立全民皆兵、寓兵于民的军队组织和国防制度,通过“即兵即民”制度实现军队与国民的密切结合,使护国之义务由全体国民共同承担,而不专责之于军人。他认为,要实行全民皆兵,就必须高度重视发挥国防组织的作用,形成强有力的国防动员体系。国防组织发达,无钱可以有钱,无人可以变为有人;相反,有钱可以变为无钱,有人可以变为无人。他把建立健全的国防组织视为中国国防的首要问题,通过组织建设提高国防管理能力和水平、实施国家总动员,借此把各种物质与精神的资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还认为,政体和制度堪称国力综合体的“原动力”,应当大力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使人民有参与政治之权利,也有保卫国家之义务,充分调动全体国民的国防积极性。

建立“既能吃饭,又能打仗”的国防制度。蒋百里主张,在国防建设中要贯彻“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的原则,使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实现协调发展。具体说来,就是使国防经费的投入向有利于国民产业的方向发展,把军用和民用结合起来,使“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③,让国防开支发挥出最大效益。他认为,如果一块钱在四万万人中转一转,这一块钱就发生了四万万的作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因国家贫穷无力

① 蒋百里:《国防论》,第二篇第四章,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

② 同上书,第四篇第二章,国力与武力与兵力。

③ 同上书,导言 第一种。

从事大规模国防建设的问题。在具体的国防经济建设方面，他不反对举借外债以加快重工业建设，但强调要立足本国，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要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争取站在世界的先进行列。从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出发，他还主张平时应把武器的研究与大量生产区别开来，研究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粮食属于重要的战争潜力要素，战时的粮食充足供应对士气有着极大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稠密国家，农业务须求自足。国力之大小与国防交通发达程度关系至为密切，提高中国国防力，必须下大力改善国防交通布局。

加强国防教育，建立强大的“精神国防”。蒋百里认为，无形的精神因素在战争中远较有形的物质因素重要。“国力者，人力之集也。国力之要素，以国民之体力、智力、道德力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于武力则尤大。”^①“二十世纪之国防责任，乃不在精练之兵，而在健全之民。”^②他主张通过“文武合一”的办法提高国民与军队的素质，建议规定每个高中学生每年要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只有专门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才有担任军官的资格，从而达到兵民相通、寓兵于民的目的。对于军人，除进行军纪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外，还要特别提倡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全军一贯的爱国心。

（四）以战略持久为核心的对日作战指导思想

蒋百里在判断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对国家后，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应当以战略持久战来指导对日战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明确提出，一旦中日双方爆发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③。“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④他反复强调，在这场持久战中，中国人民“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垮而后已”^⑤。蒋百里所谓的“拖”，就是对日采取持久消耗战略。

实行战略上的纵深防御，以空间换时间。蒋百里强调，对日作战

① 蒋百里：《国防论》，第四篇，国力与武力与兵力。

②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③ 同上书，第五篇第一章，裁兵与国防。

④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⑤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184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

“应以整个全体的局势着眼”，无须太关注一城一地之得失，在兵力部署上应坚持纵深防御，而不是采用一线制，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①他在1923年提出的决战“三阳”，就是典型的纵深防御。从地理上看，“三阳线”大致上是中国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联结地带，按他的设想，只要固守此线，便能立足山川纵横、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与敌人展开持久消耗战。而敌人将在此线以东地区被迫分散，遭受损耗。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战及“三阳线”决战的理论和构想，对蒋介石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采纳，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中心思想。1932年11月，蒋介石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中国以弱对强，战时当努力经营长江流域，以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1935年，蒋介石又决定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中国政府抗日战争的中心战略。

战略持久必须坚持坚韧，坚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蒋百里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性格后指出：“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我民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这次抗战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的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②他坚信，中华民族虽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却是世界上最富有抵抗力、自卫力的民族，绝不会亡在日本人的手里。所以，他公开宣称，对日作战“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要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他还在《国防论》扉页上郑重题词：“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中，

① 蒋百里：《国防论》，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② 蒋百里：《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1938年8月至9月撰写。